

# 照顧工作外包化： 照顧失能女性老人的家庭分工動態

張國偉

## 一、前言與研究目的

根據內政部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註 1）至 2007 年 10 月底止，我國 65 歲以上老人總計有 233 萬 133 人，占總人口之 10.16%，老化指數 57.57%，整體呈現出增加趨勢。隨著高齡人口數量的增加，台灣地區對於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就養之需求亦隨之提高。2007 年 10 月底止，我國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除內政部主管之 997 所外，加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之榮譽國民之家 14 家（安養機構）及 4 家自費安養中心，合計 1,015 所；進住人數合計 46,576 人（其中榮民之家有 9,541 人），占老年人

口之 2.00%。

將視角轉到嘉義縣，我們可以看到至 2006 年底止，嘉義縣的老人安養護機構總數為 23 家，整體的實際進駐人數 947 人，而嘉義縣全縣之 60 歲以上老人數量有 103,629 人，其中包含男性 48,729 人，女性 54,900 人。

（註 2）因此，由上述可以得知尚有十萬多位 60 歲以上的高齡長者仍與家人、配偶、親戚同住在一起，亦或是長期獨居的生活情況。先暫且不管其居住狀況為何，上述的狀況，我們可以知道：即便是台灣目前有安養護機構不斷增加的趨勢（不管公立或是私立），家庭場域仍是嘉義縣地區 60 歲以上的高齡長者主要生活及受照顧的場域〔高達 99%（註 3）〕。

既然家庭為嘉義縣地區照顧高

齡長者的主要單位與場域，那麼針對家庭的照顧行為進行研究與觀察，便顯得相當重要。而關於家庭的研究，對於傳統的社會學研究或是現代化的社會政策研究當中，都充滿了許多值得研究之處，尤其是當許多國內外的研究都在使用國際性的鉅觀資料進行討論：台灣是否存在東亞福利體制的同時，卻少見有研究會直接針對家庭這個基本的場域進行研究與觀察。

因此，本研究的重要研究目的即是，欲藉由深度訪談並觀察，來瞭解當一個家庭如何進行照顧家中長者，尤其是身體機能越來越衰弱之後，整個家庭成員的社會連帶關係，以及子女們對於需要照顧的家庭長輩如何合作與行動進行照顧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藉由訪談他們對於「照顧行動」與「傳統孝道」認知的差距狀況，瞭解當「孝道」與「照顧」產生衝突時，他們會如何協調並解決？

簡單來說，東亞福利體制的討論，主要是認為傳統儒家「文化」，尤其是「孝道」的觀念會影響社會的福利體制與社會政策。東方和西方國家的不同點在於，因受傳統孝道的影響，所以以家庭為福利單位的思維已經深深鑲嵌於日常生活的習慣之

中。雖然已經有許多福利學者（受西方教育）、專家、政府官員、國家機器等，於台灣努力的推動西方社會福利體制，但是研究者認為，就台灣地區的在地行為（常民或是大眾）而言，（註 4）仍對於所謂的西方福利制度可能是處於資訊不充分的狀態，因此，對於西方先進國家老人安養護的專業知識，或是對於社會政策使用的福利知識，以及懂得使用公部門提供服務的福利使用，可能是明顯存在著認知的差距。

根據許多調查研究「家庭」，大多顯示親代的確還是大部分與子代同住，雖然這樣的期望與行為有逐漸式微，但是仍有高達六成的家戶這樣進行著（葉光輝，1997）。一方面，可以說因為傳統文化（孝道）的影響，一方面則是因為老人的安養護機構容量實在不多，且在價格與品質不容易取得均衡點，尤其是在非都市化的地區。

因此，本研究欲瞭解的是當家中有高齡失能老人需要照顧時，其家庭成員之間是如何互相合作與協調的進行照顧工作，以及其居住安排、與金錢安排、時間衝突時，他們又是如何進行。簡單的來說，就是：訪問家族中成年且成家的長子、次子之家戶成員對於無法自理生活且長期需要

照顧的母親，他們所採取的各自行動為何？且如何取得照顧的均衡點？在均衡點未達到時，所產生的成本考量為何？以及其間產生的衝突有哪些？然後如何藉由市場或制度的力量解決這些衝突？

## 二、文獻探討

### 孝的文化與居住安排

在傳統華人社會的觀念裡，父母年老時與子女同住並由子女照顧奉養，是一種社會習俗。就父母的立場，當自己年老力衰、希望有所依靠時，兒孫能陪伴身邊，共同居住，享受含飴弄孫的樂事。就子女的立場，當自己長大成人，獨立自主並從事生產時，可以回饋父母養育之恩，對父母負起照顧責任，是一種天經地義的事。但是這樣的孝道文化真的一直是這樣嗎？還是有其根本性的漸變呢？本段我們將從「孝道文化」在親代與子代之間的改變進行討論。

雖然儒家文化的傳統對於中國地區鄰近的許多國家（如日本、韓國、台灣等）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根據葉光輝（1997: 126~131）整理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歷史（從周朝至清朝）之法令規定變遷中，可以看到

如果將子孫未與父母或祖父母同住視為大不孝的觀點，似乎越來越趨淡薄。也就是說，歷朝歷代，越來越放寬這樣嚴謹的規定。

另一方面對照現今台灣民眾對於老人居住安排與孝道觀念的態度來說，若重視孝道價值所反映的意義，是肯定同堂奉養父母的傳統家長制，則它與近年來對於「家庭結構變遷」及「老人居住安排」的實際調查結果相比對，是呈現互相矛盾的現象。近年來，對家庭結構變遷及老人居住安排情形的相關研究顯示，台灣社會在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的影響下，核心家庭數所占的比重不僅顯著超過主幹家庭數的比重，而且逐年增加（徐良熙、林忠正，1984；齊力，1990）。同樣的，雖然資料顯示大部分年長的老人仍至少和一個已婚子女住在一起，但是老人獨居或僅與配偶同住的比例也是逐年增加的。（羅紀琮，1987；行政院主計處，1992）。

可是，另一方面學者研究，若就孝道觀念下各種項目的內容，可以發現他們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對於「親自奔喪」、「感念親恩」、「尊敬雙親」及「侍奉雙親」等四項具體孝道內容，到現在為止仍然受到台灣民眾高度的重視；而至於「榮耀雙親」、「保護雙親」及「陪侍在側（婚

後同住)」等三項內容，則是屬於逐漸降低其重視程度的孝道觀念；至於「傳宗接代」及「抑己順親」則是已式微的孝道觀念（葉光輝，1997）。若單從與照顧奉養父母緊密關連的「同住」及「供養」兩項孝道內涵討論，其他學者的研究調查顯示子女期望同住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願意提供生活費的比例卻是逐年增加（孫得雄，1991）。

雖然許多學者的研究已經大致上可以瞭解台灣地區老年人與家庭子女同住與否以及觀念的變遷過程，但是面對人們壽命增加的趨勢，以及失能者需照顧的時間、精神、體力需求日漸增加的情況下，與家中需受專業照顧者，是否會造成子女在照顧上的困擾，進而影響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意願，似乎就比較少看到這方面的討論，因此，也造成本研究發問的重點之一。

### 照顧的需求與居住安排

雖然上一段落，已看到台灣地區的子與年老父母同注意願與比例產生些微下降，但是在面臨家中有需專業護理照顧之雙親時，還是會有出現照顧負擔以及要不要安排他們進駐老人安養護機構的考量。而關於居住家裡或是專業老人安養護機構來

接受照顧的研究文獻指出，許多英、美國家當中，其專業的護理之家或是養護中心都早在二十世紀末期，已開始強調與養護居住者的情感與身體需要優先性，並給予照顧員工更多的自主性等工作文化，讓照顧者與受照顧者彼此都得到鼓勵與支持，這樣的作法，一方面可以有效增加情感式照顧的價值與受照顧住民的照顧品質，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照顧員工的工作品質（Cancian, 2000）。

甚至從專業的照顧角度來看，機構照顧者認為有時在機構（專業、訓練）比在家（愛、負面情緒）可以受到更完善的照顧，雖然在家照顧在情感支持以及回應個別化需求時，會比機構照顧來的好，但是機構的專業性護理人員輪班、以及機構的專業化設備與有計畫的照顧，卻是家庭無法做到的（Stone 2000: 93~95）。

### 照顧工作與照顧責任

家庭日常生活事物的再生產、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長期以來被國家官僚與社會大眾歸為私領域、女性化的瑣碎事物，在台灣，至今仍然缺乏完善的公共政策與設施來分擔再生產（老人照顧、兒童照顧等）的社會責任。因此，照顧的工作與責任則多半落入女性的肩膀上，尤其是媳婦身

上。如果一個社會是處於政府介入的角色不足情況下，即表示國家將照顧責任丟回家庭，讓家庭在市場上購買服務或是由家庭自行解決，再加上市場上對於性別角色的分工與認同有差異因素影響下，將會使得家中有人（老人或小孩或病人）需受照顧時，往往讓女性家庭內的留在家庭內從事照顧的工作，進而減低她們出去工作而使得她們的外在資源（薪資收入、社會保障等）顯然比男性少，加上「女性是天生的照顧者」的論點（Stoller 1992; Touminen 2000; Stone 2000; Cancian 2000），更加使得她們不得不負起照顧家中成員的主要責任。

雖然西方學者 Daniel（2005: 58～63）指出，照顧責任分擔其實是呈現一種類似差序格局的層次狀況，其最主要原因在於每個人或每個家庭或每個國家其「時間」、「金錢」和「資源」都是有限的，使得我們無法提供照顧給每一個需要的人和公平的照顧（即便是我們很有心想要做），而對於照顧責任與照顧倫理的普及化，最困難的問題是在於，依據這個模型來實踐的話，將會遇到當人們資源有限的時候，則只會提供給自己，或者自己最為親密的人。因此，當每個家戶或家庭都是如此狀況

時，台灣的老人在家照顧公共化即無法實現，因為並非所有的老年人都會有人照顧，且不是每個家庭都有足夠的資源可以進行照顧。

Stone（2000: 93～95）研究指出：當家中的主要照顧者在面對失能的受照顧者（主要是家庭成員）時，家庭照顧者（通常是女性，如媳婦）會承受相當大的壓力，所以他們也會在家庭關係中引起許多負面的印象與情緒，而只有當家庭負擔不了或不可能負擔時，才會想辦法轉移至公領域（公部門的協助）或是轉向購買市場的服務（民間的照顧商品服務），於是家庭內的照顧提供者通常都存在著高度的身心壓力，而大多數人（通常是男性，尤其是丈夫）都會忽略她們的痛苦、不滿、與挫折。而照顧外包化（聘用外籍家務工作者，進行照顧的工作），則是台灣目前最普遍的作法。

### 照顧外包化

在台灣，家庭日常生活事物的再生產、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長期以來被國家官僚與社會大眾歸為私領域、女性化的瑣碎事物，在男性中心的學術傳統裡也是邊緣化的研究主題。因此，至今在台灣而言，仍然缺乏完善的公共政策與設施來分擔再

生產的社會責任。因此，在這樣的文化與制度環境下，不少台灣家庭利用跨國流動的勞動力來自力救濟（藍佩嘉，2004）。這也就是 Lister（2003）所指稱商品化的照顧型態，會使得便宜的女性勞工、外籍移民，變成灰色勞動市場上的受害者。而「照顧外包」就是目前台灣地區最常採取的行為（藍佩嘉，2004：65），其主要是指媳婦主動購買市場上的勞動力來外包服侍婆婆的媳婦責任之「孝親照顧的轉包鍊」（the transfer chain of filial care）的社會機制，（註 5）轉包除了勞動轉包之外，尚有避免代間衝突，也就是媳婦和婆婆之間的家務衝突出現。

台灣政府在九〇年代初期正式開放引進外籍勞工，1992 年更進一步開放引進家庭幫傭及監護工。此項政策主要是針對台灣社會在核心雙薪家庭擴張及人口逐年老化的趨勢下，對於照顧兒童、老人、長期臥床需要照顧等的家庭成員的需求量大增。儘管政府對於雇用條件有嚴格的

規範，但是近十年來，台灣的家庭雇用外籍家務勞工的數量仍呈現持續成長的情況。根據勞委會的最新統計至 2007 年 11 月底止，政府核准的外籍勞工的總數達到 35 萬 7,705 人，其中外籍看護工有 15 萬 9,934 人，家庭幫傭有 2,538 人，兩者加起來從事家務工作的國際勞工總數為 16 萬 2,472 人，高達 45.42% 的比例。其中台灣最偏好的家務勞工為印尼籍，高達 88.06%，第二名則是越南籍高達 51.32%，也就是說這兩類的國籍勞工，進來台灣工作的主要工作項目是家務工作的內容。其餘國家引進大都從事工業與農業的工作。

根據藍佩嘉（2005：5）研究指出，1999 年至 2002 年間，印尼籍的家務勞工大幅成長，市場佔有率從 15% 上升到 70%，菲律賓的比例則從八成降至兩成。從最新的資料看來，這樣的成長趨勢不斷，且逐漸會轉變成印尼籍、越南籍、菲律賓籍三大類女性從事家務勞工的工作態勢。

表一 臺閩地區家務勞工人數區分國籍及比例

	總計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蒙古
引進總數	357,705	114,126	11	86,632	87,653	69,258	25
外籍看護工 (A)	159,934	99,238	0	23,477	1,821	35,390	8
家庭幫傭 (B)	2,538	1,267	0	1,096	23	152	0
家務勞工 (A + B)	162,472	100,505	0	24,573	1,844	35,542	8
比例	45.42%	88.06%	0.00%	28.36%	2.10%	51.32%	32.00%

附註：製造業二年期滿重整係指六行業十五種職業、六十八行業、七十三行業、陶瓷等六行業、三 K 行業、七行業專案、新廠及擴充設備、經加、科園區專案等二年工作期滿重新申請。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項目

這樣的轉變是有其人為的操縱因素，根據她的研究指出，主要是在於仲介業者與家庭申請者之間的資訊不充分，並將他們塑造出三類的「他者移工」描述，例如菲律賓為西化的他者，教育程度高、聰明、但是喜歡交朋友會逃跑；印尼則是傳統的他者，服從性高、單純但是反應較慢，沒有逃跑；越南則是共產主義的他者，近華人文化、吃苦耐勞但是沒有經驗要耐心溝通，逃跑的程度比較低（藍佩嘉，2005：32～34）。而這樣的區分主要是為了仲介印勞可以獲取比仲介非勞更高的利益。家務勞動是指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下，透過各式各樣的形式或是仲介公司來完成工作，且其工作內容是為了維持日常家庭事務（包含清潔、照顧等），並且會獲得補償（即工資、薪水）等（Lan,

2003）。

而會聘僱海外的移動女性工作者，起先大都是因為都市區的雙薪家庭中，女性的教育程度高，人力資本高，在經過所謂的「理性計算」成本與利潤得失之後，認為這樣做是對於家戶經濟較為有益，且方便的方式，因此便開始在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城市興起一股聘僱海外家務勞工。可是，作者卻發現連都市化程度不高的嘉義縣大林鎮上，一條長達一百多公尺的街道上，大約有 20 戶左右，即有高達八戶人家聘僱外籍家務勞工來進行照顧的工作，可見往市場購買照顧服務的方式，已不再是都市程度較高的地方才有的。也激發了本研究對於其照顧成本的分擔，以及向市場購買服務的動態過程，產生了好奇。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質性研究當中最常使用的深度訪談法。主要是訪問居住在嘉義縣大林鎮上的一門經濟家戶，因為家戶內有需要照顧的失能長者，因此透過聯繫，作者親自訪問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訪問，並且說明研究目的後，受訪者亦同意接受訪問。

資料收集的時間於 2007 年 10 月至 2007 年 11 月底止，訪談地點，皆為受訪者之家中。共訪問四次，每次兩小時。因為進行深度訪談時，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者已經很確定自己研究的問題意識為何？且在訪談的過程當中避免被受訪者過度牽引，而迷失了自己的問題焦點，因此本研究所採取的不是半結構式的訪談稿，而是清楚列出幾個大方向的問題，並抓緊這些問題在訪問的過程中，不斷透過聊天式的訪問，使受訪者可以暢所欲言的述說。（註 6）

簡單的來說，本研究屬於個案研究的一種，主要的研究個案為嘉義縣大林鎮市區內的一門家戶。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家戶內在面對家中有失能的高齡女性親人時，其分工的狀態與溝通協調的過程、而遇有意見

相左時該如何解決、以及無法解決如何決定採取照顧外包，即是向市場購買照顧服務的過程。

而主要的問題如下：針對被照顧者的居住安排，以及照顧者的照顧「時間」分擔、照顧「金錢」分擔、照顧工作之「性別」分擔，在家戶內如何進行？當照顧工作或照顧負擔出現衝突時，家庭成員間如何去協調與解決？如何決定聘僱外傭（向市場購買服務）的動態過程？照顧工作外包後的家庭分工狀況？子代對於「照顧」與「孝順文化」（或習俗）之間的關連？

爾·貝比（Earl Babbie）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註 7）一書中就提到，所有從事社會研究的研究者們必須注意：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時，最首要的倫理規則就是必須對於研究者無害；其次，要注意的倫理即是參與者必須出於自願。而本研究則是經過研究者同意受訪後，才約時間進行訪談；其次，避免對於研究者產生傷害之最好的辦法，即是將研究的最後結果，給予參與者閱讀，並與其討論書寫的適當性。

### 四、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研究發現之論述方



式，則是依照文獻檢討的順序，依序書寫出訪談後的結果。首先是，「孝的文化與居住安排」。這裡主要的用意是想藉由本次訪談瞭解，現代人對於子女婚後有無與父母同住是否屬於不孝的行為呢？並與葉光輝（1997）針對台北市 84 戶研究樣本進行比較。根據他的研究可以發現「親代」和「子代」兩世代都是認為婚後「不一定」與父母同住為大多數，且親代占了 60%，子代占了 81%。亦即不同住不一定是孝。深究其不一定同住的原因，則是以價值觀不同、會有衝突與磨擦出現比例較高，且婚後子女以及親代也都渴望擁有自主獨立的空間，但是經過考慮父母親的狀況後，仍出現同住比較容易照顧的心理影響存在。

所以進行訪問時，因為受訪者家戶照顧年紀高達 87 歲的失能女性老人，因此基於照顧的專業與孝道倫理，研究者即想到，要是受照顧者真的需要相當專業的老人養護機構照護，是否會影響到其對於孝道的規範，亦或是受到鄰居或社區的所謂「孝順」或「不孝順」的閒話家常之影響呢？訪談結果顯示，顯然越年輕的子代，對於這類孝順已不再受傳統孝道的規範。例如，三兒子阿宗即談到：（註 8）

其實我是覺得不會。因為這個問題，我會先想我自己，我以後吃老時（台語），如果被送進養老中心呢？因為像我媽這樣的情形，變成拖累這些少年ㄟ（指受訪者的兒子），因為吃老，人不舒服送醫院啊，他們就要上班，無閒啊（台語），對否？啊他怎麼辦呢？他（指兒子）雖然有心、很孝順、他老婆也沒怨言、但是你要想歐，他們也是要上班，要他們請假一下載我們去醫院，還是我們自己在家，發生跌倒或什麼的，該怎麼辦呢？人一旦老了，一定會有一些無法控制的意外會發生，你說我就不想跌倒，那有

什麼辦法，人剛上完廁所，地上一灘水，剛好踩到、跌倒，那時候要叫誰呢？我是想說，我以後吃老，就自己乖一點，去養老院住，至少還有一些同年紀的人，可以講一些古早的事情，我是感覺這樣算是還好啦。啊你想說，像我媽這一代的想法，把我送去安養中心就是不孝，這我倒不覺得。

顯然的，子代對於照顧父母親的「孝道文化」是不受其他社會網絡的規範，而是會更加替下一代著想，尤其是照顧者對於目前經驗照顧失能長者之負荷並非簡單一個「孝順」即可，反而是一種現實生活狀態的反思，當子女皆是雙薪工作者，他們也會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更加使得他們對於自身以後的老年生活給予子代更加包容的心態，來面對往後他們子女可能產生的照顧負擔顧慮。

可是，雖然子代對於這類孝順的考慮已經有所轉變，但是當親代提出堅持的意見時，子代（照顧者）仍是相當尊重親代（受照顧者）的意見，且儘量為其設想。一開始阿宗的太太（三媳婦）即提出兩個照顧母親的方案，一個是將她送進安養院，另一個即是聘請外籍看護工來幫忙照顧，於是便私下與受照顧者商量。

三四冬前，那時候我就跟媽這樣說，沒有人在妳旁邊很危險，然後我就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送去安養中心，一個是聘外勞啦，就去跟她商量，她說打死她也不去安養中心，態度很堅決，安捏！一開始跟她說時，你也知道，她就直接說，妳是在趕我是嗎？要請外勞照顧她，她就說，怕東西不見了，有的沒有的等，盧很久，不想就對了。

雖然目前在鎮上，已出現三家以上的老人安養護專業機構出現，而從專業的角度來看，機構照顧者認為有時在機構（專業、訓練）比在家（愛、負面情緒）可以受到更完善的照顧，雖然在家照顧在情感支持以及回應個別化需求時，會比機構照顧來的好，但是機構的專業性護理人員輪班、以及機構的專業化設備與有計畫的照顧，比在家接受照顧來得好（Stone, 2000）。但是，這似乎不是影響家中老人照顧居住安排的主要決定因素，亦即品質提升、供給量增加，即會使得使用者增加並擴大市場。因為，住或不住進老人安養護機構的決定，在台灣仍是以受照顧者（親代）的主觀意願來決定（葉光輝，1997），這是無法勉強的，除非親代本身願意進駐安養、養護中心或是醫療長照機構，而這樣的結果，在本研究家戶中，也是呈現相同的情況。

家庭日常生活事物的再生產、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長期以來被國家官僚與社會大眾歸為私領域、女性化的瑣碎事物，在男性中心的學術傳統裡也是邊緣化的研究主題，至今在台灣而言，仍然缺乏完善的公共政策與設施來分擔再生產的社會責任。在漢人社會的文化傳統中，居住安排、財

產繼承，以及權威分配原則上都是根據父傳子的親族軸線，女兒在嫁入以她丈夫為首的家庭後，被原生家庭視為「潑出去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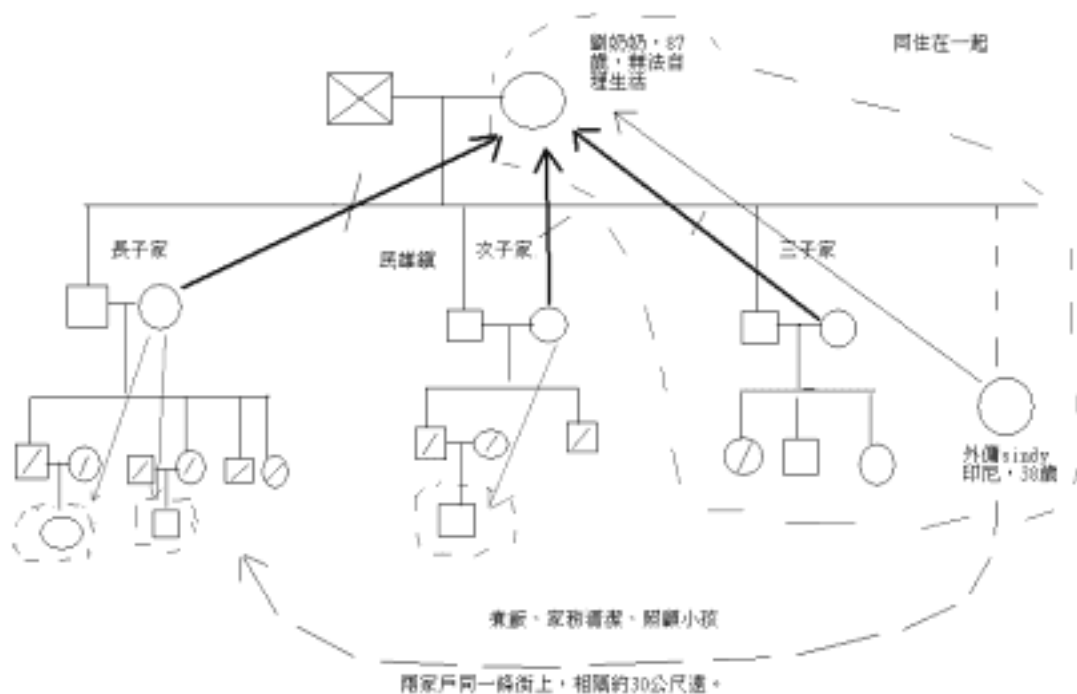
因此，傳統上，奉養父母的責任是落在男生，且按照長幼次序來安排，但是受訪家戶的照顧方式卻呈現出，失能母親居住在三兒子家的情況，因此對於此，本研究也相當的好奇，這是自然形成的嗎？還是經過協調過後的結果呢？為何會如此呢？而阿宗也提到，這當然不是一開始就是如此安排的，而是有些家戶經濟上與生活照顧上的考量：

當時，我爸未去世前，是在我大哥那邊住，然後等我生完第三個女兒（目前高三），蓋新房子，然後我媽就過來這邊住，大約有十七年了。因為當初大哥那邊是需要做生意，我這邊是站家（台語），攔來是當初住那邊是在二樓睡覺，但是母親越來越不能爬樓梯了，所以就搬過來這邊的一

樓住。

下圖，我們可以大略看到家戶成員如何照顧家中的女性失能長者。劉奶奶（受照顧者）的先生約於 17 年前去世，兩人共育有六名子女（註 9），其中大兒子與三兒子皆住在同一條街上，而二兒子則搬遷至民雄獨立家戶，她也於丈夫去世後，基於身體退化以及大兒子一樓無法居住而

搬遷至三兒子的一樓居住，至兩年前（85 歲時），她的身體狀況則更加弱化，兩年內共住院好幾次，這中間也衍生出一些照顧上的意見相左。其中，大媳婦、二媳婦是全職家庭主婦，三媳婦則先後擔任過診所護士、○○證券營業員、目前任職○○銀行證券營業員。長子為○醫診所（○○執業）、次子（○○執業）亦是，三子則是於長子家幫忙齒模工作。



一開始，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可以知道，在 2005 年以前，劉奶奶都尚能處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功能。雖然如此，但是有時仍需要他人幫忙，而這

些幫忙的事項就落在三個兒子的太太，也就是被照顧者的媳婦身上。

其實她一直都自己用，攏免人照顧(台語)，因為她們這年紀的老人，算意志力較堅強，她不想麻煩別人，只是有時候洗澡的時候會叫媳婦來幫她洗。約兩年前她才無法自己洗，不然都還是自己洗。所以這兩年是大嫂、二嫂、我輪流幫她洗澡，時間都是她們三個自己喬。雖然因為她坐輪椅，她還是想自己來，算是隱私吧，不然之前，我們一直都想幫她請外籍幫傭來幫她，她說不要。

當然照顧老人除了洗澡之外，三餐也是相當重要的事項，因為牙齒的退化，或是咀嚼功能不如年輕人一樣強壯，加上需要重視油和鹽的適當性，所以也常造成年輕媳婦的困擾，所以最後三餐即變成大媳婦的主要負責工作，另外，因為大媳婦是大兒

子的太太，因此也就變成「這是應該做的事」。

因為我某煮菜的方式，不適合她，就是老人家喜歡吃爛一點的，青菜、肉、飯都要煮爛一點的，後來用買的給她吃，但她一直覺得不好吃，大嫂因為煮的比較爛(台語)，所以她喜歡吃，也會考慮她小時候喜歡吃的口味，她(指太太)不是炸雞就是薯條，所以這絕對不合，對吧！哈哈，這算是婆媳間的那個那個啦！洗衣服，大嫂也會拿回去洗，阿母就是住在這裡，然後看顧、照顧而已。

因此，從這裡可以看到，此家戶在尚未聘請外籍看護工時，照顧家中失能女性老人則是落在媳婦身上，當然長媳婦的責任與工作是最重的，其餘媳婦的工作也不是那麼少，有時長

媳婦無法照顧時，就得由其他兩位來幫忙代勞。在時間方面，當然是由三位女性自行協調，金錢方面的支出，則大都由長子支出日常生活的費用，性別方面，當然則是女性為主，一方面是受照顧者為女性，一方面是被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照顧方式。

這也呼應了 Daniel (2005: 58~63) 研究當中，所指的照顧責任分擔呈現一種差序格局的層次狀況，因為時間、金錢和資源有限，使得我們無法提供照顧給每一個需要的人和公平的照顧，依據這個模型，會遇到當資源有限的時候，我們只會提供給我們自己，或者我們最親密的人。而誰來提供照顧呢？當然就是在性別分工與認同有不平等之下的女性配偶被視為是「天生的照顧者」(Stoller, 1992; Touminen, 2000; Stone, 2000; Cancian, 2000)

由照顧衝突至照顧外包。當然，老人家身體健康，可以自己自理生活事物，是對於同住的子女而言一件相當快樂的事，因為不需要長時期的待在她的身邊照顧。但是，實際上卻沒有這麼完美與理想的事情發生。隨著年紀越大，人的身體就會越趨弱化，尤其是長期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因此一有狀況發生即會使整個家戶的負

擔加重，所以日常生活的照顧衝突，即常常發生。例如，此家戶長輩（被照顧者）住院的醫療處置狀況，就常變成為家族成員意見相左的重要爭執點。

例如有一陣子母親的腳趾頭，指

甲「當甲」(台語)，且嚴重到爛掉，

大家都提議說母啊的腳趾頭要切

掉，但是三媳婦就說：不能切！不能

切！如果切下去的話，會變成整隻腿

攏去(台語)，最後是截肢，那時候，

去嘉義基督教醫院給醫生看，醫生就

說：骨頭都黑了，無效啦，切切好啦

(台語)，這實際上還是手術啊，所

以說，他們可以請高額的健保給付什

麼的，所以醫生是不會考慮病人後續

如何。那時候三媳婦就是堅持說：不

能切，如果切了以後，要鋸腿截肢，誰可以負責呢？後來，就沒人敢主張要切除，決定權回到老大那邊決定。

還有一次，送去醫院，要插尿管，大家又攞揮了（台語），二媳婦說插尿管比較好，三媳婦說不能插，因為插了以後，管子要常常換，插一次進去又抽一次出來，再插一次進去又抽一次出來，最容易感染。母親患有糖尿病，如果產生腹內感染就很難控制，寧願說用紙尿布包著，更換紙尿布，也不能插管。結果就包紙尿布包到現在。

但是隨著這兩年，不斷發生的緊急住院事件，以及老人家的身體越趨弱化，導致媳婦、兒子們抽出時間來

照顧的時間加長，也增加照顧的工作量，因此提出照顧外包的聲音也就越來越多次，強度也越來越強。

母親最需要人家照顧是二月份時，吃飯吃到一半時噎到、昏倒，然後趕緊送嘉基急診，然後救起來，後來回來時，送到平林安養中心一個月。因為一方面母親越來越不行，有點大人孩子性，就會一直唉說：我很可憐啊，你們都不來看我啦，我要吃什麼，之類的，希望親人多重視她。所以就變成一種更重的負擔，也常常從家裡打電話過來店裡，要大媳婦過去，或是臨時打電話過去民雄要二媳婦趕快回來等，所以就逐漸變成一種困擾，所以就是要請一個 24 小時的

看護，有一個人可以任她差遣。

當然這樣的想法一提出，立即打破了由媳婦照顧的無成本照顧工作，長子也基於成本考量，一開始持反對的意見，而整個家族的主要決策也都以家長制的長子為重時，就會變得困難重重。

這樣說好了，因為老大算是生意人，所以一開始會考慮成本這東西，家裡的人照顧不用開什睇錢啦。攞是大媳婦在弄較多啦。

後來，因為提出此意見以及希望將照顧外包的家族成員越來越多，媳婦照顧的負擔也越來越重，加上照顧者年紀也越來越大，以及大媳婦與二媳婦也都需要花時間照顧他們自己的孫子（參考圖一），才動搖了老大的意見，決定聘請外籍看護工。

大約於 2006 年 10 月份左右，三兄弟開會，決定要聘請外傭，老大找

朋友提出申請，至 2007 年 3 月份才

過來。因為在 2006 年 10 月份，母親

有一次胃絞痛，去住嘉基住院好幾

天，那一次老大就有說要請外傭，因

為那時，晚上都是我（三兒子）在醫

院顧母親，在那邊過夜，好像有兩次

還是三次吧，反正只要是母親住院，

就是我去顧。就是因為一直跟老大說

說，加上嫂、二嫂、與三媳婦也都做

得真甘苦（辛苦的意思），後來才集

合大家商量。

上述的結果，與 Stone（2000: 93～95）研究相符：在面對失能的受照顧者時，家庭照顧者會承受相當大的壓力，所以會在家庭關係中引起許多負面的情緒，而當家庭負擔不了或不可能負擔時，才會轉至公領域，於是家庭內的照顧者提供者通常都存在



著高度的身心壓力，而大多數人都會忽略她們的痛苦、不滿、與挫折。但是通常這樣的結果，會將照顧轉移至公領域，也就是將被照顧者送至安養或養護中心接受照顧，成為住民。但是基於被照顧者的意願尊重與考量，這個家戶選擇了聘用外籍家務勞工來進行照顧的工作。

因為照顧衝突在這幾年不斷增加，且強度越來越強，整個家族的人尤其是主要照顧者對於照顧負擔無法負荷時，家中長子也無法在堅持成本考量的想法。此時，在家族成員有了高度共識下，家戶的長子透過自己的社會網絡，尋找仲介公司，經由仲介公司介紹較可靠、好用的外勞來照顧家裡的女性老人。仲介公司基於利潤的考量當然會大量推薦印勞的申請。

我的朋友，認識一個仲介公司的老闆，在朴子那邊，啊我就他跟拜託，叫他跟仲介公司說，然後要他找好一點的。因為仲介公司也很要緊，一方面是立案與口碑的問題，一方面

是依商品來說可以說是一種售後服務啦，就是外勞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們跟仲介反應，仲介就要要幫我們處理，那就是售後服務啊。

聘請外籍家務勞工雖然將照顧時間、照顧負擔外包，但是主要的家族成員負擔就是將這些無形的負擔轉換成有價的成本負擔，也就是外籍家務勞工的工資與申請進來的成本，要如何負擔呢？因為這個家族共有三名男丁，雖然以各自成家立業，但是傳統以來，男生就必須負擔照顧自己年老父母親的責任與義務，所以當他們開會決議時，就決定價格如何分擔。

因為是三兄弟嘛，當初請外傭的基本工資要兩萬五至兩萬六，老大的意思是說，二哥那邊沒有去住，也比較遠，所以就是二哥和我出七千，其餘都是大哥負責，但是就是要去老大

那邊幫忙煮飯、洗衣服、拖地等，負責一些清潔的東西。啊我這邊，有時候就是要拖拖地、掃一下地，早上衣服批批耶（台語），碗筷自己吃一吃自己洗這樣。家務算是到做一下（台語）。後來，因為老大聘用老三，所以老三的薪水是老大發的，所以知道我賺多少，後來，他就說叫我出三千。其餘他出。所以老二就是七千就對了。

這裡，我們大致上可以清楚看到當家戶中有失能長者時，他們是如何動態分工來照顧家中失能的女性長者。一開始被照顧者可以自行照顧時，家中的衝突比較少，最主要是由大媳婦負責三餐的烹煮以及被照顧者的衣服清潔，而身體清潔部分以及日常生活部分，則是被照顧者自行整理。隨著年紀逐漸增長，身體狀況不

如以前，吞嚥食物出現狀況、身體機能逐一衰弱的情況下，照顧需求的頻率與強度大幅增加，不止主要照顧者的負擔加重，連不參與照顧的男性也受到影響，長子無法在堅持無成本的女性繼續照顧，加上受照顧者堅持決不住進專業的安養護機構的情抗下，家族成員舉行開會，並決定聘請外籍家務看護工，並商討照顧成本如何負擔。

上述的照顧外包過程，與藍佩嘉（2004: 65）所稱的媳婦主動購買市場上的勞動力來外包服侍婆婆的媳婦責任之「孝親照顧的轉包鍊」（the transfer chain of filial care）的社會機制（註 10）有些為不同。本研究之媳婦除了三媳婦回到勞動市場當個全職勞動者之外，大媳婦和二媳婦依然是全職家庭主婦，且長子和次子的家務工作依然由兩位女性來從事，甚至外包的決定權是由長子的來決定，顯然在不同家戶型態之下，家戶的權力與外包的過程，會出現不同的外包決定狀況。

而與藍的研究出現類似情形，是在於外包「孝道」的過程中，家務工作的事務，也會跟著由外籍家務勞工來從事，尤其是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到雖然當初聘請外籍家務勞工是為照顧失能的婆婆之日常生活照

顧，但是外籍家務勞工所從事的工作，並不只是如此，尚需要負責清潔工作、烹煮工作、洗衣工作、偶而需要幫忙照顧小孩餵食的工作（參考圖一）。

在老大那邊煮飯、洗衣服、拖地等，負責一些清潔的東西。啊我這邊，有時候就是要拖拖地、掃一下地，早上衣服批批耶（台語），碗筷自己吃一吃自己洗這樣。家務算是幫忙做一下（台語）。外傭煮，大媳婦會親自教她怎麼煮，怎麼餵，因為還有正餐與點心。菜錢都是大兒子那邊出。這麼說好了，午餐、晚餐在大兒子那邊煮，在那邊吃，然後在準備晚餐的時候，多煮一些，那過來我這邊冷藏，早上起來熱一下給啊媽吃。有

時候新鮮的蔬菜要現煮，就會在我這邊煮，這些事情做完後，其餘都是她自由活動的時間。

上述藍佩嘉（2004）的研究，指出轉包除了勞動轉包之外，尚有避免代間衝突，也就是媳婦和婆婆之間的家務衝突出現。但是本研究的家戶沒有此項功能出現，原因在於長者（受照顧者）失能情況較為嚴重，因此婆媳之間的角力與衝突較少出現。但是，雖然沒有婆媳的衝突，可是這樣的家務勞動轉包，主要的原因在於照顧服務工作的市場化，或者說國家與政府沒有積極介入，且社會大眾對於所謂的照顧倫理價值，以及給予照顧者較為尊重的工作待遇以及制度，似乎不存在。因此，使得台灣的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婦一肩挑起照顧的重擔，而當她們無法負荷時，往外購買照顧服務，也使得另一批女性（外國家務移工居多）為了薪水而挑起這個照顧負擔。如果在醫藥衛生不退步的情況下，台灣地區老化速度勢必將會使越來越多家戶面臨老人照顧與小孩照顧的難題，年輕的女性從照顧自己的兒童到照顧自己的婆婆，甚至中

老年以後還要照顧自己的孫子，也使得越來越多家戶申請外籍家務勞工的機會增加，變成一種國際性的家務照顧外包化社會。

##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質性訪談家戶對於照顧家中失能女性長者之動態分工，發現：首先，居住安排與孝道觀念的關係已漸漸互相獨立，最主要的決定性關鍵還是在受照顧者本身的居注意願；其次，女性（尤其是媳婦）依然被視為家中的主要照顧者，但是其決定照顧外包化的過程，是不斷的溝通與協調的結果；第三，照顧外包化，其主要的照顧工作依然是女性，而只是轉移到外籍家務勞工身上。這也是照顧倫理與照顧工作一直不被重視的後果。

全台灣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16 萬 2,472 人國際勞工，在台灣從事家務勞動的工作，其中以印尼、菲律賓、越南為最大數量的國家。台灣的家戶（家庭）透過這樣的勞動外包，一方面可以協調母職、妻職、媳婦職之間的性別角色與家庭責任的衝突，一方面可以避免家務與勞動市場的蠟燭兩頭燒情況，來和父職討價還價提高女性的平等權（藍佩嘉，2003；2004；

2005）。在這裡本研究提供的是另一種情況，在大多數家族成員負擔過重、且主要照顧者（三位媳婦）年紀衰老以及需要照顧嬰幼兒（二位媳婦）時，即使是無酬家務勞動者，亦會互相團結起來，要求將照顧外包。

聘僱外籍家務勞工，是一種國家缺席、外勞補位的市場化照顧政策，也反映出台灣得社會仍然把家事工作和照顧老人、小孩的工作定義為女人的天職、家庭的負擔，而非社會集體分擔的公共責任。因為國家不管、丈夫不做，讓再生產勞動成為女人的工作。事實上，國外較先進的福利國家對於再生產勞動的介入除了提供親職保險照顧假或提供居家服務（如丹麥）、免除照顧者經濟的補助（如英國）、提供彈性的兼職工作（荷蘭）等（Knijn & Kremer 1997），給予照顧者與受照顧者相關措施，並強調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重要性，除了道德的責任之外，照顧接受者的需求也應該被滿足等，這樣的情況在台灣尚須一段時間，但本文仍希望藉由一個家戶的照顧行動展演，讓更多人體任照顧的內容。

（本文作者張國偉現為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生）

## 📖 註 釋

- 註 1：<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 12/27/2007。
- 註 2：<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參考內政部 2006 年各縣市別的人口統計資料，並將 60 歲以上人口加總計算得出。
- 註 3：將進駐人口數：947 人除以 103,629 人，得出 99.08% 的比例。
- 註 4：尤其是未接觸或是對於西方的社會福利制度與政策鮮知的個人、家庭們。
- 註 5：這樣的轉包過程，有兩個社會機制在運作。第一個是「性別轉包」（gender transfer），第二個則是「市場轉包」（market transfer）。概念的討論請參考（Lan 2002）。
- 註 6：詳細參考：陳介玄（2004）「企業研究的深度訪談與資料分析」，《質性研究方法及其超越》，嘉義，南華，101～122。
- 註 7：參考：李美華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Earl Babbie 著，台北，時英出版社。
- 註 8：這裡的受訪者皆用假名，方便撰寫。受訪者皆用台語回答，有時夾雜一些國語，因此請於閱讀時，盡量用台語為主要的理解語言。
- 註 9：基於女兒嫁出去以夫家為重以及畫圖技術上的限制，三名女兒的家戶就不列入。
- 註 10：這樣的轉包過程，有兩個社會機制在運作。第一個是「性別轉包」（gender transfer），第二個則是「市場轉包」（market transfer）。概念的討論請參考（Lan 2002）。

## 📖 參考文獻

- 行政院主計處編（1992）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 李美華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Earl Babbie 著，台北：時英出版社。
- 孫得雄（1991）社會變遷中的中國家庭：以台灣為例，中國家庭及其變遷，喬健編，33～5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暨亞太研究所。
- 徐良熙、林忠正（1984）家庭結構與社會變遷：中美單親家庭之比較，中國社會學刊（8），1～22。
- 陳介玄（2004）企業研究的深度訪談與資料分析，質性研究方法及其超越，嘉義，南華，101～122。
- 葉光輝（1997）年老父母居住安排的心理學研究：孝道觀點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3），121～168。
- 葉光輝（1998）孝道概念的心理學探討：雙層次孝道認知特徵的發展歷程，本土心理學研究期刊（9），53～117。
- 齊力（1990）台灣地區近二十年來家戶核心化趨勢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社

會學刊（20），41～83。

藍佩嘉（2004）女人何苦爲難女人？雇用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台灣社會學（8），43～97。

藍佩嘉（2005）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台灣社會學刊（34），1～57。

羅紀琮（1987）近十年來台灣老人家庭結構變遷的研究，台灣經濟預測 18（2），83～107。

Cancian, F. M. (2000) Paid emotional care: Organizational forms that encourage nurturance. In M. Harrington Meyer (Ed.), Care work, gender labor and welfare state. (pp.136-149) New York: Routledge.

Engster, Daniel (2005) Rethinking Care Theory: The Practice of Caring and the Obligation to Care. *Hypatia*, 20(3).

Knij, T., & Kremer, M. (1997) Gender and the Caring Dimension of Welfare States: Toward Inclusive Citizenship. *Social Politics*, 4(3), 328-361.

Lister, R. (2003). Women's Social Citizenship: Earning and Caring. In *Citizenship: Feminist Perspectives* (pp.167-194) New York: Palgrave.

Pei-Chia Lan. (2003) MAID OR MADAM? Filipina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ontinuity of Domestic Labor. *Gender & Society*, 17(2), pp.187-208.

Stoller, P. E. (1992)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ences of caregiving spouses. In J. W. Dwyer & R. T. Coward (Eds.), *Gender, Families, and elder care*. (pp. 49-64)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Stone, D. (2000) Caring by the book. In M. Harrington Meyer (Ed.), *Care work, gender labor and the welfare state* (pp.89-112) New York: Routledge.

Touminen, M. (2000) The Conflicts of Caring: Gender, Race, Ethnicity and Individualism in Family Child Care. In M. H. Meyer (Ed.), *Care Work: Gender, Labor and the Welfare State* (pp. 112-135) New York: Routledge.